



苏国勋 主编

LE RETOUR DE L'ACTEUR

行动者的归来

[法] 阿兰·图海纳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社会学名著译丛

行动者的归来

〔法〕阿兰·图海纳 著

舒诗伟 许甘露 蔡宜刚 译

孟慧新 校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动者的归来/(法)图海纳著;舒诗伟,许甘霖,蔡
宜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社会学名著译丛)

ISBN 7-100-05305-6

I. 行… II. ①图…②舒… III. 社会学—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185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社会学名著译丛

行动者的归来

[法] 阿兰·图海纳 著

舒诗伟 许甘霖 蔡宜刚 译

孟慧新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5305-6/C·15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³/₄

定价:18.00 元

Alain Touraine

LE RETOUR DE L'ACTEUR

World copyright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4

根据法国法雅尔出版社 1984 年版译出

社会学名著译丛

总 序

学术史著,经典之谓也,通常是指学术大家所撰文本及其思想。中国文化传统强调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在这样的文脉里大家其人与其文本及其思想之间是互为表里、相互佐证的。在中国学术传统里,经典历来居于核心地位,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或如有人所说,在这一领域,所有后来者都是踩着巨人们的臂膀向上攀登的。言外之意,在社会研究领域,人们讲究传承下的创新,向不轻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不轻信什么“顶峰”之类。这点与自然科学适成鲜明对照。自然科学追求的是一种科学的真理,它是一种约定性的、假设性的、命题性的真理。这是一种工具性的标准,故它关注真理标准以及证实真理即经验检验的前提——方法论问题。简言之,这是一种有用即被采纳的实用理路。因此,自然科学的某些成就可能在相对较短时间里譬如几年、几十年就会被超越、被颠覆。而社会科学追求的真理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属性,其次才是一种命题的属性;一个人是否拥有真理,端赖于他与某一“此在”或体现真理的实在是否保有共享关系,因而,这种真理是一种存在的真理,这是一种目的性的标准。存在真理要有意志论的和形而上的预设,意志论预设关乎能对人的行动起激励作用的情感和愿望方面,而形而上预设则有关实在之本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这样说并不否认社会研究也有其

2 行动者的归来

方法论的方面,而是说它与意志论和形而上相比只居次要地位。不消说,后两方面都与研究者本人的传承、学识、洞见、表达能力等学术修养方面有殊多关联。这也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大家及其文本居于核心地位的存在理据。

社会学从创立之初,就自我期许要把社会研究变成一门科学并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强调以自然科学方法和成就为摹本几乎成为这门学科一百多年来发展的主流。但这并不构成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统一科学观要求社会科学要像自然科学那样仅把经验事实视为思想的源头并减少对经典关注的理由,因为经验主义在关注经验事实的同时却忽略了选择事实所依据的启示性原则。这种启示性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前提预设,一种本质上先于经验的理性思考。社会科学的探究毫无疑问要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但同样明确的是,社会研究除了经验事实之外还要关注能对经验观察提供启示的那些原则,即还要有超越经验的理性思辨。从知识社会的传统来说,社会学就是这样地处于经验论与先验论、实证论与唯理论之间的对立张力中,因为它所要研究的是由人们的行动结果所造就而成的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固然有如一般客观事实那样处在的第一级表层物理结构,但它还有其内在的属于人的第二级深层意义结构;它毕竟不只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而且还是由意义—动机引发的行动所构成的现象,即社会的物,亦即由观念构成的实在。职是之故,社会学自十九世纪上半期创立迄今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不仅在经验观察、量化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在标志人类理智成长的社会理论领域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造就成群星璀璨、相映成辉的繁荣景象。

由这些大家阐发的不同启示性原则之间也有歧见,因为每一种

原则都是基于自身原理对外物的一维解释,只要坚持首尾一贯性做到逻辑自洽,就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又不能自诩是对外物穷尽无遗的把握。这些启示性原则并不具有像自然科学中那种在时间中流动呈线性累积的进步特征,而是一种抽象的、一般性的约定。故科学研究越是抽象化、一般化,其具有的累积性特征就越少。这些启示性原则与其说是关于外在世界的真理性标准,毋宁说只是提供了关于这一标准的最低程度的共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它仰赖于一个特殊的文化共同体相对一致的利益、旨趣和偏好的支撑,表现了个人从审美上、哲学上、诠释上、观察等方面上对作为现代性之生命的体验、理解和领悟的表意能力。归根到底,作为这些启示性原则之结晶的经典,类似一种顿悟式的人类理智能力的偶然性(个体性)贡献。它或由于对人类精神状态和主观倾向的睿智洞察如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之穿透力,或由于对经验世界的复杂性、敏锐性重构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商品及其规律的揭示,或由于对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的评价如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诠释,而成为经典并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中心,进而构成社会理论中具有范式般指导意义的三大传统,为人类理智在社会领域继续向上攀登奠定了基础。

人们通常把这些大家在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事实所表现出的想像能力、穿透能力和批判能力直白地称为“社会学的学科意识”,意即经由一代代大家们累积起来的学术素养和传承,包括他们强烈的社会关怀的情愫,这些是社会学的“根”或“灵魂”。社会学如果丧失了自己在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的学科意识,也就是失掉了自己的灵魂。无异于取消了自己存在的理据。这里强调大家及其文本在认识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目的在于克服时下一些号称“实证研究”的著述只罗列经验事实不作理论思考的流弊,避免由此导致对社会现象的

4 行动者的归来

单面、一维的理解。对社会学来说,所谓增强学科意识,除了参与、观察变革社会的实践之外,就是要提倡阅读经典、研究大家,舍此别无他途。

商务印书馆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推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哺育了几代学人,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提升汉语学界学术水准居功至伟,海内外华人学界同仁有口皆碑。现今又专门辟出社会学名著译丛系列,这一举措对于充实和扩展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规模效应可谓锦上添花,但对社会学知识的普及和提升研究水准不啻雪中送炭,可说恰逢其时。

谨以上述感怀序写于丛书付梓之际,并与社会学界同仁共勉。

苏国勋

于2006年岁末

目 录

导言	1
----------	---

第一篇 社会生活的新体现

第一章 从社会到社会行动	11
第二章 社会学的蜕变	35
第三章 现代性的危机	45
第四章 社会生活有主轴吗?	55

第二篇 行动社会学

第五章 八种消除行动社会学的方式	67
第六章 社会运动:社会学分析的特定对象还是主要问题?	88
第七章 认同的两种面孔	103
第八章 变迁与发展	113
第九章 行动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式介入	122

第三篇 质疑目前

第十章 程控社会的诞生	137
第十一章 新社会冲突	154
第十二章 社会运动的衰微	168

2 行动者的归来

第十三章 社会运动、革命与民主	184
后记	202
附录一 英译本前言	211
附录二 与图海纳的会谈	232

导 言

社会学是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特定分析模式而建立起来的。这个由社会学所描绘出的社会系统,仿佛是由一股从传统到现代性、自信仰到理性、由再生产到生产,以及——如同滕尼斯(F. Tönnies)所发展到极致的公式——由共同体(*Gemeinschaft*)到社会(*Gesellschaft*)的潮流所引动。这一切都明白地把社会与现代性画上等号。也因此,行动者在其中若不是给界定为推动进步的施为者(*agents*),就是朝向现代化发展中的障碍。作为经济变迁的主角,资本家被视为粗暴但极有效率的巧匠,使理性、市场、分工和利益得以凌驾一切;而从事劳工运动者,也以同样的方式体现(*represent*)为反抗非理性谋利的劳力捍卫者,以及对抗经济危机之消耗的生产力斗士。

在政治领域,民主也不是由自身定义的,而是根据那摧毁寡头政治、特权以及各种旧政权的意志来界定的;同样,在教育领域,学校被赋予的任务则是把学童由其出身、家庭背景,以及支配这一切的地方精英所造成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这一切都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并非通过其自身性质、更非经其内在秩序而界定的某种有力的——如果不是振奋人心的——社会图像;这种社会是依其自身的运转而被界定的。而其行动者也同样地体现为将自己从特殊性和过去的桎梏中摆脱出来,迎接普遍性和未来。正是在这种对社会生活总括的、极为有效的分析方式中,对此系统的知识与对此间行动者的了解完美地

2 行动者的归来

扣合起来。行动者的角色和知觉,也由特定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或共和主义式(这恐怕是更好的状况)的词汇来界定。社会行动者首先是个公民;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在个人自由与参与群体生活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区隔。

但在过去 50 年中,这种体现社会生活的方式已陷入危机,也因此,我们在这里以一种间接而又明确与之划清界线的方式将其称为“古典社会学”。一方面,在社会与社会系统这类极度含糊的字眼下,我们开始看到不是由某个阶级就是由国家所掌控的各种支配形式。现代性有时也转变成野蛮。这种野蛮现象首先在欧洲大陆出现,其矛头则直接指向西欧的犹太人。在这个或许比任何社会族群更认同进步理念、而在与其他族裔同化时又能维持自身文化的犹太人族群遭到消灭的同时,进步的理念也被践踏得支离破碎。与此同时,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也因古拉格(Gulag)集中营而告幻灭。

整个断裂是如此的残酷,而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运动兴起的效应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的经济扩张时期,古典社会学得以复苏,但这次是在大西洋彼岸出现。帕森斯的理论虽然仍奉行 1914 年之前社会学的社会进化观,但它更注重社会系统整合的条件和形式,而非其现代化问题。这甚至更强化了系统分析与行动者分析之间的一致性。如此一来,社会学便得以稳固地盘踞在那两个依核心的角色观念而联在一起的互补概念上——即制度(institution)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

但这种社会学观念,远比严格意义上的古典社会学的生命周期还来得更短。行动者反叛这种系统,拒绝依据自己的社会参与来界定自身,指责统治者失去理性的帝国主义,并转而根据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而非其现代性程度来界定自身。许多西方社会在很长一段

时期,是由地方共同体向全国(national)——即使不是国际性(international)——社会的转变来界定自身的;但是当愈来愈多的社会也登上公众舞台时,民族社会及其各种“价值”的界定遂开始解体。社会行动者与社会不再一致,社会学突然又陷入危机当中。

在1960年代撼动社会的各种运动之后,这种危机也日益加深。当时对社会生活最流行也最具影响的展现方式,是把它描绘成一个支配无所不在的场景。这就没有了社会行动者的空间,他们所面对的,只是那些用以维持和强迫适应这种支配的各种无情机制。于是,行动者转而背离社会生活的各种规则,并日益将自己局限于寻求自身的身份——若不是在孤立的世界中寻找,便是在小型的唤醒意识或倡导团体(consciousness-raising and advocacy groups)中寻找。

到了1980年代初,对社会生活的体现已不再有什么主导性的看法了。把行动者首先定位为公民,以及鼓吹唯有通过更有力的集体行动和夺取国家权力才能获得个人解放的政治的(特别是民族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并受到忽视或排斥。

也因此,我们有必要以另一种社会生活的体现来取代古典社会学所做的。但是,我们应该避免掉入下面这两种幻觉:一是将社会行动者从社会系统中抽离出来加以分析;二是去描述一个缺乏任何行动者的系统。第一个幻觉的政治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它把社会化约为市场,但市场这观念无法抗拒以下的事实:这种伪经济的依据(pseudoeconomic reference)在反对前一时期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t)幻觉时虽然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由于那么多的市场受限于各种财团协定、秘密协议、政治压力、公共干预和非市场性的需求,因此它所导致的困扰比其用处还大。第二个幻觉采取同样混乱的系统论形式,那不过是功能论的一种极端形式,根据它的说法,社会系统大概会根

4 行动者的归来

据自我平衡(homeostasis)来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动。其论述往往自相矛盾,特别是一般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因为它也承认人类系统的独特性在于它们的不确定性(open-endedness),即它们具有产生和转化自身目的的能力。在这个接合点上,它与本书想描述的行动社会学十分接近。

要抗拒这个“后历史”(posthistorical)思潮的诱惑可能更为困难。当那些最古老的工业化国家(industrialized countries)觉察到自身不再拥有以往的力量和霸权(hegemony),而其内部处处充斥着自我疑虑时,一种研究永久性危机(permanent crisis)的社会学——如果不是衰退(decadence)这个充满魅力的概念——之所以受到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对快感,还有差异和瞬间的追求,对短暂相遇甚于长期关系的追求,以及完全“放纵的”社会(“permissive” society)的观念——也许有点不太自然地——嘲弄和撩拨着我们这时代的思考和社会行为,正如消失了数个世纪后又再度出现的隆冬时节的嘉年华会。

我们毋须把当前的这些社会思潮匆匆扫到一边。在这个公共舞台上,充斥着各类蹒跚的镇压机制和机构,喧嚷着各式对身份(identity)的要求,并眩晕于各种情爱与机缘的游戏;然而正是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得承担起一项某些人认为不可能的任务:重新建立对社会生活的体现。而此任务在诸如法国这样的国家又特别困难,在这里,分析的混乱正被僵死的意识形态裹尸布紧紧包覆着。

一旦人们为了正视文化——不管是科学的或风俗的——而不理睬“社会”及其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这项任务的重要性立刻变得更加清楚。这两者间的对比之强烈,也是舆论所熟知的:舆论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但对科学和伦理(ethics)的变化却表现出热忱的关切。当新一轮科学知识的激增正改变我们关于生活及遗传和智力的表述

时,我们还怎么谈论什么没落、历史的终结或永久性危机?当我们的风俗正快速变化,当我们有关生与死的表述、关于男与女以及成人与孩童关系的观念正被彻底颠覆之际,我们又怎能否定各种大规模的蜕变?

本书所处的时机,正是一个已转化的文化在呼求社会思想和政治行动进行一种互补性的转变的时候。目前这种 21 世纪的文化与拖着 19 世纪躯壳的社会的结合,不会维持多久。这种矛盾若不是导致那种表现为暴力和无理性的社会完全解体,就会因为某种新社会学的建立而得以克服。

这个新社会学在底下的章节将持续出现,事实上我在早先一些著作里也仔细讨论过^①。在此我只想表示,我将以历史质(historicity)、社会运动和主体等观念,取代以往的社会、进化和角色等核心概念,从而建立对社会生活的另一种体现。

重建的主要障碍,无疑是因为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在此姑且不谈所谓的初民社会),社会行动者之所以能负责建立公共舞台,并在上面演出有意义的和标准的剧目,仅仅是因为他们关系中的主要场域是高于他们的超社会(metasocial)场域,或者说神圣的场域。古典社会学所提出的社会性模式(societal model)也是如此:企业主与劳工所争夺的,是对进步的管理权,以及对历史意义的定向权。然而,当社会已获得这样一种作用于自身的能力,真的“现代”到可以完全世俗化(secularized)——或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去魅化(disillusioned)——之时,还可能存在一种核心原则,来为行动者和冲突的整

^① 特别是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社会的产生》(*Production de la Société*)(Paris: Seuil, 1973)。

6 行动者的归来

合定向吗?

这个问题正是本书的核心。社会运动这个观念本身并不能直接给我们什么答案,因为我们已相当远离那延续几世纪的准宗教式的各种社会运动的图像。难道过去那些以上帝、理性和历史之名为纯洁、自由、平等和正义所进行的各种斗争,在现代化社会中不是已走到穷途末路了吗?难道它们不是已经被对利益(也可以称为认同、欢乐或幸福)无可抗拒的要求所摧毁?

对历史质的观照,只有在它经历某种深刻转化之后,才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历史质在此指的是一个社会通过各种冲突和社会运动,由各文化模式建构其实践的能力。在那些被各种社会和文化再生产机制支配的“传统的”社会中,对历史质的诉求压倒一切;这种诉求以所有“进步的”革命和解放运动的精神,促使行动者挣脱各种束缚而转变为他们自己社会的生产者。相反,在那些受到管理、生产以及传播各式物质及符号商品(symbolic goods)、言说和资讯的机制的权力所支配的“现代”社会里,对历史质的诉求不会是参与(commitment)和投入(investment),而是脱离(disengagement)和抽身(distan-ciation)。

一种新的主体形象也由此浮现。或许这本书应定名为《主体的归来》:因为当行动者处于历史质的层次,或处于生产社会生活的主要规范取向的层次时,他即是“主体”。但我仍偏爱《行动者的归来》这个名字,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归来发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层次。根本的任务仍是重新界定主体:不是根据其支配和转变世界的能力,而是根据主体所设定的自身与这种能力之间,以及与那些使之运作的各种机制和话语之间的距离来界定。超越并抗拒主体的既有成就。主体被理解为相对于社会世界的所谓沉默与陌生,也被理解为想接

触他人和被承认为主体的欲望。我们在反对极权主义、反对酷刑、反对权力政治的各种口号和伪理性,以及拒斥全面隶属的主张中,都可发现主体的存在。它已经由革命的主体转变为自由主义的主体。

然而,这种主体观念的反转并不是没有危险,也不是没有局限。主要的危险在于,以非社会性(the nonsocial)之名将行动者锁在对社会性(the social)的拒斥之中,不论这种非社会性是某个个人、团体或共同体,这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中可以看到。在那里,反对由外国人撑腰之支配威权的行动,已导致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communitarian fundamentalism)出现。主体在自身与社会间所设定的距离绝不能自我封闭,它必须为行动的归来铺路,必须将自身投入社会运动或文化创新中。

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的体现,无法在一夕间开花结果:它只有随着各种新式社会行动者的形成,以及为了掌握某个已转变的历史质所进行之斗争的组织化而发展。我们有必要指明目前社会思想史中这种新的不连续性,而且也可以指出正在发生的变化之特征。那些除了危机之外无视他物,除了承认旧话语瓦解之外不闻他言的人,可能会有危机已结束仍浑然无知之虞;那些尽其所能地使社会学保持一种“将社会视为一个能够保存——无力而勉强地——其各种基本旨向原则的系统”之形象的人(不论这种形象是好是坏),他们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浓度也注定会愈来愈强。最后,那些认为当研究免于那种过于广泛之观念的掣肘时才最能有所成就的人,终究会了解:他们这个比较没野心的立场只会使研究变得软弱无力,并使研究屈从于强权的各种实际的或被认定的利益。